

EAST ASIAN STUDIES

东亚研究

主 编 季卫东
副主编 翟 新 朱 炎

第1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EAST ASIAN
STUDIES

东亚研究

第1辑

主 编 季卫东
副主编 翟 新 朱 炎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以东亚的政治、外交、法律、社会、经贸、金融、科技、文化等为研究对象,汇集海内外东亚学相关的顶尖学者作者资源,以发展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提出切实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路径为己任。本书收录福川伸次、宫本雄二、吴寄南、津上俊哉、杜进、高全喜、翟新、王勇、葛继勇、西原春夫等人的文章共 10 篇,从东亚的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研究. 第 1 辑 / 季卫东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313-20889-7

I. ①东… II. ①季… III. ①东亚—研究 IV.
①D73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4594 号

东亚研究(第 1 辑)

主 编: 季卫东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印 制: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字 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20889-7/D

定 价: 5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0.25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31011198

编委会成员

主 编 季卫东

副 主 编 翟 新 朱 炎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映芳	陈子雷	程兆奇	杜 进	管建强	归咏涛
胡令远	黄大慧	季卫东	金坚敏	金永明	林来梵
马利中	宋立水	王少普	王 勇	吴怀中	吴寄南
杨栋梁	朱建荣	朱 芒			

编辑部主任 尹 月

责 任 编 辑 赵斌玮 幸丹丹 汪 娜 刘 露 李鹏舒

中日关系,在空间上只不过“相距一衣带”,但在时间上却经历了“恩怨两千年”。从遣隋使致天子国书的故事就可以发现:日出与日落、中心与边陲、上与下、内与外之类的地理位置,其实自始至终构成两国关系最本质的隐喻,也由此塑造了东亚地缘政治的历史格局。亚洲的概念起源于以地中海东部腓尼基为界划定的日出之处(Acu)的地理框架,到18世纪才出现了作为人文的另类亚洲概念——中国风(chinoiserie)。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爆发了福泽谕吉式“脱亚入欧”与石原莞尔式“联华抗欧”之间的激烈争论。日本在19世纪末“脱亚”之后又有过两次“入亚”运动——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两次都兼有地理和人文这两种维度。孙文和冈仓天心提倡亚洲一体说,针对的是亚洲碎片化状态,着眼点是空间的形状或结构,以及关系重组的地壳运动。

从空间形状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的一个最具决定意义的状况设定就是作为近邻,相互是无从回避的,不论爱憎如何。就像仓央嘉措的诗句所描述的那样,“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好是坏,邻国势必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中国与韩国及朝鲜之间。所以,讨论中日关系不得不把复杂的东亚乃至世界格局作为基本背景和分析框架、不得不注重相关国家之间一系列“三角形”(例如中美俄、中美日、中日韩、中俄印、中俄朝、中日朝)或“三巴纹”范式的互动关系及其各种不同的组合,并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识能有某种比较客观的参照系。这也正是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著《东亚研究》系列的一个重要缘故。同时,把亚太整合以及东亚与西欧、北美之间的交错和重叠作为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关键,拓展国别研究的广度、深度,也使我们标榜的“海派日本研究”风格更加彰显,并保证对东瀛诸岛的观察具有更大战略纵深或者回旋余地。

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把握中日关系的最基本框架就是对海洋亚洲与陆地亚洲进行严格区别并分而治之的地缘政治学主张。所谓海洋亚洲,主要指那些实行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亚洲沿海国家,例如日本、新加坡、韩国,被认为具有开放性、改革性。所谓陆地亚洲,长期以来被认为以中国为代表,被贴上封闭的、内向的、固守传统

的标签。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高速增长、海洋运输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以及南海岛礁主权被不断蚕食的事态同步发生,终于唤醒了这个民族的海洋意识。以1992年领海及毗连区法的制定为起点,直到最近推进的“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中国迅速面向海洋、经略海洋、加强海上维权活动,上述二分法认识论框架似乎已经濒临瓦解。在这个过程中,以扬州为枢纽的传统运河经济网络、以上海为枢纽的现代长江经济带实际上早就打破了陆地亚洲的简单化图式。自从唐代高僧鉴真六次从扬州东渡日本以来,运河和长江流域与海上航线之间的互动日益活跃,东亚的陆海关系史也被激活和重新诠释,构成“海派日本研究”的源头活水。

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在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这两大领域存在着极大的张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欧美日各国对此持欢迎态度。总之,在经济上已经不存在坚固的、明显的疆界,中国与日本乃至欧美国家是互相交错、互相依赖甚至互相融合的。中国自加入WTO之后,经济上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自由贸易体制,并逐渐壮大起来,又让欧美日各国感到不安乃至恐惧。但是,由于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安全保障政策与在欧洲的不同,没有建立类似北约那样的集体军事机制,没有壁垒森严的对峙格局,而是通过两国同盟关系确定防务安排,这就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机会。但是,这也为美国和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搬弄是非、借助军事政治手段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提供了抓手。其具体表现就是在进入21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与日本之间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现象。在这样的特殊格局里,如何通过新的安全保障观消除亚洲邻国的疑虑并扫清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或者反过来如何通过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例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盟10+3合作机制等)化解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隔阂,避免亚洲各国因过剩防卫心理而导致军备竞赛的结局就是中国一直在努力并且有待于大智慧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如何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与日本主导的CPTPP框架衔接起来,形成亚洲太平洋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之环,也是当今“海派日本研究”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海派日本研究”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学长、著名政治家汪道涵先生早就提出的命题。根据对弘扬互信互惠、平等多元、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这个最新权威命题的理解,海派日本研究的主要特征应该是中西合璧、面向太平洋,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从而形成多元性的视角、包容性的思想。上海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引擎,是长江流域的龙头,是华东大湾区的枢纽。因此,海派研究势必更多地关注企业、贸易、金融、航运、科技创新、法律服务、城市治理、中央与地方的政府间关系等现实问题,更具有技术性、专业性以及实证性。总之,把地球与地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让

不同文明和传统和谐共处、对话沟通以及相互理解的“多维度文化(Multiculture)”，这就是海派日本研究的风格，也是本书的宗旨。

《东亚研究》既然志在弘扬“海派日本研究”，当以上海、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各省、日本乃至东亚的研究者为主要作者群，但却绝不会画地为牢，囿于一地一派的门户之见。我们欢迎全国乃至境外的相关专业学者踊跃投稿，并将不断面向东亚乃至全球组稿。第1辑的稿件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我们非常荣幸地得到了一些国际著名专家的支持。例如东洋大学理事长福川伸次先生曾经担任通产省次官，是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应主编邀请以亲身经历和独有的洞察力描述和分析了在改革开放时代中日经济合作的机制及其效果，并希望以此为基础推进东亚的地区合作。早稻田大学原总长西原春夫先生是中日法学交流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他所撰写的文章着重回忆了在上海的活动和收获，似乎也意在“海派日本研究”表示某种响应和支持。这两位大家的文章披露了一些前所未闻的重要事实情节，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日中关系学会会长宫本雄二先生曾经担任驻华大使，他在战后国际秩序发生动摇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定位中日关系，字里行间流露出丰富的真知灼见，值得仔细玩味。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家津上俊哉先生以具体事实和大量数据分析了去全球化时代中日两国的作用和问题状况，特别是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进行了周到的考察和预测，很有启示意义。曾经担任拓殖大学国际开发研究所所长华人教授杜进先生具体而深入地分析了在“美国第一”政策以及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日本外交的展开过程，考察了中日关系、美日关系的微妙变化，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2018年正值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启动40周年等重要节点，政治宪法学派的代表之一高全喜教授把《大日本帝国宪法》体现的现代国家构想与晚清中国的立宪运动进行对勘，比较分析了其中的利弊得失，引人深思。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教授则重点讨论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外延和内涵，对两国外交回暖向好的原因、机制、发展趋势及残存问题进行了周详而中肯的剖析和精准到位的判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翟新教授的论文聚焦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的台湾问题(这也可以理解为明治维新在东亚留下的负面遗产)，深入研究了日本政府“确保台湾”政策构想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矛盾，读来饶有兴味。王勇教授是中日关系史、特别是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他根据丰富的史料，从学理架构和文化疆域的视角重新界定了“东亚”概念，可谓《东亚研究》的点睛之笔。葛继勇教授则具体考证了“日本”用语的沿革和相关知识谱系，强调东亚诸国名称的空间性特征，在不经意间勾勒出了日本研究与东亚研究之间的关联。

2018年的动荡不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世界的巨变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推动全球大转型的主要动因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作为大国迅速崛起,并高举拥护经济多边主义体制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旗帜;另一种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对既有的国际秩序进行挑战。从2015年开始俄罗斯深度介入叙利亚,试图借助中东的杠杆改变全球的力量对比关系。到2016年,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稳定之锚的英美两国却突然发生异变: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掀起滔天巨浪;美国大选推出另类总统特朗普,在各国不断造成意外、反复和不确定性,构成改变全球性体制和秩序的新一波驱动力量。以上就是十年来造成世界巨变的五大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二的中国与排名第三的日本对世界稳定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东亚经济整合的条件也在不断成熟,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却还在不断增大。这就是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实质。

这样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一遇的大变局,对日本研究以及东亚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带来了知识创新的重大机遇。为了适应2019年以后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推动日本和东亚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沉淀和积累相关学术成果,为势在必行的东亚整合凝聚必要的、基本的思想共识,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决定组编《东亚研究》并力图使之尽早成为高质量的、国际知名的学术出版物。《东亚研究》的内容构成将包括专题特辑、学术论文、研究综述、动态介绍、翻译、史料、书评等栏目。但愿《东亚研究》能够承载时代使命,成为思想交流、意见碰撞的开放性平台,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的精神家园,并与一批青年才俊同步成长。也希望各位同仁和朋友今后不吝赐稿赐教!

季卫东 谨识于上海

2018年12月31日

目录

Contents

一、特辑：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	1
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的轨迹与日中经济合作的新发展	福川伸次 / 3
动摇中的战后国际秩序和日中关系	宫本雄二 / 18
行稳致远，审慎推进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	吴寄南 / 27
去全球化时代下中日两国的角色	津上俊哉 / 38
中美贸易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	杜 进 / 55
二、明治维新后果省察	67
明治宪法的国家构想及其与晚清中国的对勘	高全喜 / 69
对华复交前日本政府“确保台湾”政策构想的演变	翟 新 / 95
三、东亚的界定	109
大唐盛世与文化疆域	王 勇 / 111
汉文语境中的东方用词与国号“日本” ——《称军墓志》中的“日本”用语解析	葛继勇 / 124
四、人物与史实	137
我与上海	西原春夫 / 139
投稿须知与体例参考	151

一、特辑：改革开放与 中日关系

东亚研究
(第 1 辑)

日中经济知识交流活动的轨迹
与日中经济合作的新发展

动荡中的规范国际秩序和日中
关系

行稳致远、审慎推进中日关系进
入新时代

去全球化时代下中日关系的角色

中美贸易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

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的轨迹与 日中经济合作的新发展

福川伸次

(日本通产省前事务次官)

摘 要：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自 1980 年 10 月成立以来，为两国的经济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交流会秉持相互信赖、面向未来、政策思考和知识创新这四项理念，促进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并改善了两国的信赖关系。日中两国有识之士将借助交流会这一平台解决新课题，争取推进两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添砖加瓦。

关键词：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日中关系、日中合作前景展望

纵观历史，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东风西渐，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的原始文明进入希腊、罗马，与西方文明交融，产生了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明。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扩展的英国产业革命成果，20 世纪漂越大西洋传到美国，与美国石油工业的发端融汇奠定了近代产业的基础。其后，汽车普及，电子计算机诞生，原子能被开发利用。

20 世纪后半叶，近代产业的重心由太平洋转到亚洲区域，日本产业率先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继而亚洲区域呈现雁型经济发展模式。继 20 世纪 60 年代起至 70 年代的日本高速发展之后，80 年代前半期亚洲四小龙腾飞，80 年代后半期东盟各国突起。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10 年进入高速发展期，奠定了亚洲、欧亚大陆的发展基础，预示着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中国自 1978 年导入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到今年已经 40 载，2010 年经济规模超过日本，现今世界经济排名第 2 位。

众所周知，日本政治家大平正芳，1972 年作为外务大臣与时任首相的田中角荣共同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1978 年 12 月出任日本首相，在任职期间的 18 个月，真诚地致力于推进日中关系的发展。1979 年 12 月，大平正芳作为日本首相访华，在北京政协礼堂讲

演,当提到日中邦交正常化共同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时,他说“我作为友好邻邦的一员,衷心祝愿中国的现代化政策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访问期间,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在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谈期间,双方约定支持大平内阁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推进的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以下称“交流会”)的构想。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设想,在其后1984年与中曾根首相会谈时,被告知是受到大平首相的启示。

交流会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加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日中关系迈向新高度。但是,其使命并非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终结。从21世纪走向22世纪的过程中,无疑会有许多新的变化和难题呈现在我们面前,届时,有两千年友好交流历史的日中两国有必要携起手来共同解决这些课题。交流会肩负着不断迎接新课题的使命。

1 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的轨迹

1.1 发起的经过

1976年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开始逐步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经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安排向欧洲和日本派遣考察团,并从海外聘请专家学习市场经济原理,研究实施方略。

1978年12月24日,日中经济协会稻山嘉宽会长与谷牧副总理会谈,在说明了建设与钢铁、能源和运输等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后,为了制作具体实施计划,约定向中国派遣高级专家。据此,197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以后的交流会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大来佐武郎氏、向坂正男氏和日本兴业银行小林实调查部长被邀请访华,就经济发展模式、能源、运输物流以及筹集资金等方面提出了建议,还到地方实地视察调研。1979年10月12日第2次访华,为时两周,就中方提出的问题介绍了日本的经验。

1979年12月,由于日本内阁改组,大来氏被任命为大平内阁的外务大臣,暂时离任交流会的工作,稻山氏推荐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原国土事务次官下河边淳氏接替大来氏继续参与交流会的工作。

随着调研的深入,中方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多,萌发了由各种专家参加进行交叉研讨的设想。1980年10月中旬,下河边氏访华时提议,为了利于专家长期进行学术和意见交流,应该建立有组织的、系统的和多面化的研讨交流机制。这个提议得到谷牧副总理和大来氏的认可,确立了交流会发起成立的基础。

大平正芳去世后,日本内阁更换,已经辞任外务大臣的大来佐武郎于1980年10月

31日与谷牧副总理会谈,确认了基本设想,成立“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会员人数双方各7~10名,谷牧氏与大来氏出任顾问,每年召开1至2次会议。

经过充分的准备,1981年5月6日至16日,交流会第一届会议在神奈川县箱根町举行。双方各出席10人,中方的首席代表为马洪,日方的首席代表为向坂正男。此次会议针对日中两国经济的最新动向和展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就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调节和计划作用、日本的经济合作经验、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等双方高度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首届会议成功举行,交流会顺利地起航了。我是从1991年5月召开的第11届大会(大分县城岛高原)开始参加交流会活动的。

以下,分5个时期来分析评价交流会的发展过程。

1.2 第1时期——中国改革的基础形成阶段(1981~1991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打造市场构造的基础开始,将以自力更生和计划经济为轴心的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绝非易事,需要反复试行,不断摸索。

虽然中国政府阶段性地放宽了价格限制和数量分配,但是起初进展很缓慢。1980年,广东省深圳市等设立经济特区,积极吸引外国企业进入,这个政策才渐渐地被中外了解。

第2届会议自1982年5月6日起从重庆市出发,乘船在长江上举行了3天。第3届会议以后,先后在长崎县云仙市、广东省深圳市、长野县轻井泽町、新疆乌鲁木齐、石川县金泽市、辽宁省大连市、北海道札幌市、福建省厦门市及大分县城岛高原召开。会议期间,介绍了许多日本从战后复兴到高速增长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据说中方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一时期的议题是,鉴于中国经济改革正处于初期阶段,主要以日本经验为焦点,研究讨论市场机制的意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经济结构的改革、能源供需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服务型经济的振兴等问题。

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实现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和技术“四个现代化”,1980年,日本政府决定在经济发展基础的铁路、港口、道路和发电等方面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交流会的议题也涉及了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海外投资开始不断扩大,交流会也就这些相关政策进行了热烈讨论。

我所属的通商产业省历来深切关注日中经济关系的改善,20世纪60年代以高碕达之助为中心积极地进行过备忘录贸易等经贸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就经济结构改革问题,开始了事务次官的“高层次协商”,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我也参加了

1987年和1988年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商务部等部门的干部进行了友善的意见交换,并一起到地方进行了调研。

随着对华投资的扩大,1988年10月,通商产业省派遣以日本兴业银行行长池浦氏为团长的中国投资调查团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大连市进行投资状况调研,我也作为顾问随团参加。所到之地都得到投资状况的积极反馈,成为扩大企业投资的契机。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浦东新区的开发计划。

第9届交流会(1989年5月10~12日在北海道札幌市举办)后,一些国家实施对华经济制裁,日本率先解除了经济制裁。第10届交流会按照预定日期于1990年在福建省厦门市成功举办。

1.3 第2时期——市场机制充实阶段(1992~2000年)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社会对市场机制关心的热度增高,成为加速经济增长的契机。由此引发吸引外资、对华投资的热潮。

中国在整合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围绕这个概念,交流会也展开了热烈讨论。

1992年以后,交流会依次在山西省太原市、和歌山县南纪白浜、山东省济南市、静冈县御殿场市、海南省海口市、东京、陕西省西安市、宫崎县宫崎市和湖北省武汉市举办。这些会议的议题大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加速经济增长政策。此外,中方对日本高速增长期实施的结构改革也很感兴趣。日本进入90年代后,“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萧条,交流会对此也展开了讨论。

1997年,由于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世界对亚洲经济的不安感逐渐扩散,好在由于日本的金融支援而开始趋于安定。虽然日本对华投资一时暂停,但中国政府坚实的经济运作,维持了货币价值,受到了高度赞扬。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入WTO已经成为切实需要,中国需要面向更加开放型的经济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同时,政策上的关注点,也逐渐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率的改革、清洁生产方式的改革、消除城乡差别等重要课题上来,交流会围绕这些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995年1月,日本发生阪神淡路大地震,中国发来了无数温暖的问候。同时,交流会开始研讨神户地区和长江流域合作项目的可行性。

2000年4月,交流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第20届会议,总结了此前的成果,并协商未来的发展。宴会席间,谷牧氏以“源远流长”一句概括了交流会的特色。

1.4 第3时期——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推进阶段(2001~2007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由此中国走向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新阶段:阶段性地放宽对外商的限制,取消地方和行业限制,撤销出口定额,废除出资比例规定等,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

第21届交流会于2001年12月在兵库县神户市召开,接着继续在云南省昆明市、富山县富山市、甘肃省兰州市、滋贺县大津市、四川省成都市和爱媛县松山市召开。这一时期,重点关注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国际贡献。

WTO从2001年开始进行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交流会就其意义和效果进行了讨论,就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协议书的实施体制、产业技术体系改革、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等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方介绍了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和内容,双方就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合作方式也进行了讨论。

2007年,中国政府推进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税制的内外统一、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出口优惠政策的调整、反垄断法的制定、引进促进产业政策的修改、外资政策的调整等,以便实现内外资企业的统一。对此,交流会讨论的重点便集中在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上。

1.5 第4时期——国际金融经济调整阶段(2008~2012年)

这一时期的关注重心,转向从全球化视野看日中两国经济的国际发展和亚洲合作。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同年10月,中国政府公布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安排,振兴经济,扩大需求,对世界经济的安定作出了很大贡献。

2008年6月,交流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了第28届会议,会议广泛讨论了国际金融局势。2009年5月,交流会在冲绳县名护市召开了第29届会议,更为深入地讨论了国际金融危机问题。

2010年4月,我们在北京邀请前辈们一起举行了交流会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回顾过去的30年,确认了其意义和成果。其后,辗转到重庆召开了第30届交流会。第31届交流会在静岡県静岡市召开,第32届会议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

2008年5月,中国发生四川大地震。2011年3月,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怀着相互问候的心情,第31届交流会将合作防灾问题提上了议程。

这一时期,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集中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方面。2009年11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加入G8,组成G20,继续发挥G8协调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安定的核心作用。无疑,G20这一国际经济运作模式受到热切关注。

继续关注地球环境问题。2009年12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国会议设定

了新的框架,交流会围绕这一课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此外,针对过去遗留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排除权交易等节能减排效果的对策、先进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等问题交流会也进行了讨论。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占据世界第2位,此后中国将在国际上发挥什么作用,日中两国又将开展怎样的国际合作,议题由此开始转向世界性课题。

1.6 第5时期——全球化展开阶段(2015年至今)

2012年9月,当时因野田内阁采取购岛的措施,中国对此强烈抗议。因此,非常遗憾,交流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中断,两年未召开会议。

其后事态好转,第33届交流会于2015年4月在兵库县神户市召开。接着在陕西省西安市、岛根县松江市……直至第37届会议于2018年4月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

2017年1月,美国特朗普总统就任,开始采取“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这一时期交流会的议题是:如何评价美国的政策变化?为了世界经济的安定日中两国应如何合作?日本是如何应对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的?会议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同时,会议集中研讨了如何推进全球创新驱动发展,日中两国如何相互合作等问题。

2 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的特色

2018年,日中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已经走进第46个年头,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在此期间,虽然也有些许摩擦,但是日中关系基本上得到了切实的发展,交流会毫无懈怠地持续召开,为两国的经济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列举其几个特色,如下。

2.1 相互信赖

交流会的第1个特色是成员之间建立了坚实的信赖关系。这一点表现在,除了一个时期例外,必须每年1届在双方有传统的地方召开会议。在20周年纪念仪式上,吴仪副总理在祝词中说到,“20年来,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活动从未间断。双方成员定期就两国经济中的综合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充分交换意见,互相学习借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与知识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促进中日双方的地区经济合作也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道出了相互信赖的意义。

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交流会日中双方成员围绕教科书的